

思勉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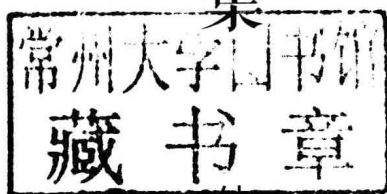
钟泰学术文集



钟
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钟泰学术文集



钟泰 著
陈贇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钟泰学术文集/钟泰著;陈赟编.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
(思勉文库/杨国荣主编)
ISBN 978-7-208-10596-6

I. ①钟… II. ①钟…②陈… III. ①国学—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7429 号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 思勉文库 ·

钟泰学术文集

钟 泰 著

陈 赟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4 字数 363,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596-6/B·920

定价 48.00 元

总 序

杨国荣

“思勉文库”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部分著名学者的著作选辑，文库的选编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其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80 多年来，这里先后汇聚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建树与学术影响的学者，如吕思勉、施蛰存、冯契、徐震堃、许杰、吴泽、王元化、苏渊雷、陈旭麓、李平心、戴家祥等。在几代学者的前后传承中，华东师范大学不仅在人文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逐渐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其特点包括：注重学术积累、鼓励创造性思考、倡导严谨的学风、贯通中西之学，等等。收入文库的学术著作，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以上传统，其作者既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又在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文库中的著作跨越了 20 世纪的前半叶与后半叶，它们融入于学界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学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呈现某种同步的形态。从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化看，近代以来，中西之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二者的联系首先不是一个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在近代以前，中西之学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展开的，除了明清之际等短暂的、零星的接触之外，二者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但到了近代后，情况有所改变，西学的东渐以及中学对此所作的各种回应，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事实上，随着西学的东渐及中西之学的相遇，西学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参照背景和视域，并在实质的层面与形式的层面使其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后者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的开放性。20 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收入文库的著作，也体现了类似的视域，其中凝结的研究成果，则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注入了实质的内容。

在宽泛的意义上,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呈现为二重形态:它既以编年意义上的历史为其表现形式,又体现于具有内在思想关联的逻辑脉络之中。逻辑脉络中的历史展示的主要是学术思想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条理、内在秩序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则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史上各种体系之间的先后发生、前后相继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把握。当然,逻辑脉络中的历史与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并非互不相关,事实上,二者是同一思想演化历史过程的不同面向。

与学术思想史的以上区分相应,从研究方式上看,可以区分两种进路,其一侧重于历史考察,其二则更多地指向理论的阐释。理论的阐释主要以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出发点,侧重于揭示思想衍化的内在脉络。作为研究方式,理论的阐释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就特定的思想系统而言,理论的阐释主要在于揭示、把握一种学说系统的主导原则与观念,并进一步分析这个主导的观念和其他相关论点之间的关系。在考察、梳理具体的思想系统时,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侧重于把某一思想系统的多方面的内容归属主导的原则,或者说,将一种体系的不同内容纳入其主导脉络或主导原则。以理论的阐释为方式,体系中的多重思想趋向,往往被置于同一主导原则或宗旨下加以理解;体系之中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每每被视为主导原则的体现或逻辑展开。从不同的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更多地侧重于揭示各个体系之间内在的共同趋向、思想脉络、逻辑关系,等等。

与理论的阐释相对的是历史考察的方式。历史考察以思想史上具体的思想情景作为出发点,更多地关注一个思想体系自身的多重性和多方面性,包括思想可能具有的内在张力。在确认思想体系内含多方面性、多重性的同时,历史考察进一步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如果存在内在张力,则具体考察这种张力对体系的内在影响以及它形成的内在根源,等等。同时,它又更为关注思想发生的历史背景,注重考察一种具体的学说系统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此外,它也注意从经验的层面上考察制约思想体系的多重因素,包括生活处境等对思想家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质言之,历史考察的方式更多地表现为将思想体系还原到它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具体的思想史情境)中,由此再现其具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对这种具体性、多样

性和丰富性形成的根源给予历史的解释。

从学术思想史研究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和历史考察的方式都不可或缺,如果忽视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仅仅专注于历史考察,往往会使思想史研究流于对一些枝节的琐碎关注,把注意之点主要放在那些思想史上的个别、特殊的细节,而难以真正把握思想演化过程所具有的内在的逻辑关联与脉络,这样的思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容易变成材料的罗列或单纯的语境分析。反之,如果仅仅关注理论的阐释的方式,而忽视历史考察的方式,思想史研究往往会忽略思想演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将思想史化为抽象的概念演化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地略去思想史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丰富规定,使之成为一种抽象、空洞的逻辑框架。

进而言之,历史考察与理论阐释之间关系,同时涉及历史的回溯与理论建构的互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就史论史或为历史而历史的过程,在更深的层面,它同时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和理论思考相联系。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时代有原创性的学者,总是在回顾、总结以往学术思想成果之后,进而提出他们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叙述之上;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则为这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不难看到,在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阐述以及理论的建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过程。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二者可以有所侧重,但有所侧重不能理解为彼此划界,史与思无法截然分离。

收入“思勉文库”的著作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象各异,但都在不同的意义上展现了历史衍化与逻辑脉络的统一。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历史的深沉,也不难领略思想的睿智。在学术进路上,文库中的著作固然存在不同侧重:一些主要以历史源流的疏通为指向,另一些则更多地关注于理论的阐释或理论的构建,但这种不同的侧重,又基于史与思的统一这一共同的基础。要而言之,以“学无中西”、“史”“思”的统一为视域,文库中的学术著作既展示了富有个性的理论品格,又蕴含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意义,由此,它们也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思想印记。

2011年7月28日

目 录

庄子发微（内篇）

《庄子发微》引	蒋礼鸿 2
《庄子发微》序	钟泰 3
内篇	5
逍遥游	7
齐物论	20
养生主	42
人间世	48
德充符	67
大宗师	80
应帝王	103

中国哲学史（上古卷）

凡例	114
第一章 上古之思想	115
第二章 王官六艺之学	120
第三章 老子 附管子	123
第四章 孔子	130
第五章 墨子 附宋钲	136
第六章 杨子	142
第七章 商君 尸子附见	145
第八章 庄子 附列子	151
第九章 孟子 附曾子 子思 又告子附见	157
第十章 惠施 公孙龙 附尹文子	164
第十一章 荀子	173
第十二章 韩非 申子 慎子附见	182
第十三章 秦灭古学	189

国学概论（六艺篇、诸子篇、汉宋异同篇）

卢序	192
序	193
六艺篇	194
诸子篇	210
汉宋异同篇	219

单篇论文与序跋

校定《管子·侈靡篇》	230
论书传说殷庚五迁数自汤迁亳之误	261
墨翟非印度人辨	264
论两汉选举孝廉	269
《荀注订补》序	272
学蔽	274
朱子之诗	278
《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序	284
读庄发例	286
谈《庄子》研究	297
读庄偶记（内篇）	301
读庄偶记（外篇）	324
读庄偶记（杂篇）	348
潘雨廷《周易终始》序	367
刘策成《庄子集解补正》《庄子解故辨正》合刊序	369

附录

附录一 钟泰小传	372
附录二 钟泰主要著述目录	374
后记	376

庄子发微(内篇)

《庄子发微》引

蒋礼鸿

先师钟山先生以邃于老庄闻，其于庄子之书沉潜盖数十年，以为庄子之书一溷于道家，再溷于神仙家而其旨晦。其溷于神仙家，学者能辨之；其溷于道家，鲜有能辨者。韩退之、苏子瞻，或以为周之学出于子夏，或以为周之于孔子阳挤而阴助，乃与世之论庄周者异。然亦但求之于文，未能会通庄书之蕴与其宗本，未知周之内圣外王之学乃宗于孔氏而为颜渊之传也。即师之所见，亦尝以为周之学盖兼综儒老，晚乃知其不然，斯可谓学与年进，探本握枢者矣。既病解庄者之多失，乃比类六经之旨，较以苦县之书，以为《庄子发微》一书，沉吟篇章，反复义旨，博考而详说之，其于阐发庄旨，粹然成一家之言，尚论者必不得而遗也。予小子，于庄书之闳深而肆，师说之缜密以粟初无会解，既以其书介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姑缀数言以为引云。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弟子蒋礼鸿志。

《庄子发微》序

钟 泰

自司马迁作《史记》以庄子附《老子传》中，班固《汉书·艺文志》用刘歆《七略》入庄子于道家，遂世遂以老、庄并称，而庄子之学半晦；自方技之神仙家与诸子之道家混，隋、唐之际被《庄子》以《南华真经》之名，其后疏注《庄子》者如成玄英、褚伯秀之伦，多为黄冠羽士，视《庄子》为修真炼气之书，而庄子之学全晦。庄子之非神仙家，今之学者或能辨之；若其非道家而不同于老子，则能辨之者鲜矣。予之始读《庄子》也，于《天下》篇庄子自述其学特与老子异，已窃疑之。及观《说剑》篇中乃有“夫子必儒服”之语，以为如《史记》列传所言庄子方剽剥儒、墨，以诋訾孔子为事，何其门下为文反称其儒服？使非其实，门人又何为而诬之？疑之益深。其后读韩愈、苏轼之文。愈谓孔子之道源远流而末益分，子夏之徒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见《昌黎集·送王埴秀才序》轼则云“庄子盖助孔子者”，又云庄子于孔子，盖“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见《东坡集·庄子祠堂记》于是而知古之人固已有先我而疑《史记》、《汉书》为不足信，而不欲从之者，则予之疑为非妄发，因复尽检《庄子》三十三篇之书而研核之。其称孔子，或曰孔子，或曰夫子，而于老子，则每曰老聃，轻重之间固已甚有别矣。其引述孔子之言，除《盗跖》、《渔父》之篇出于其末流假托者外，多至二十有八，若老子之言才十有四，又什九皆与孔子相问对。夫孔子尝问学于老子，老子于孔子不时有箴砭之辞，此皆无足深讳。《寓言》篇：“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以是意推之，则其引老子之所以箴砭孔子者，正以见孔子之学之化而日进，是固孔子之大，而非必老子之道果胜于孔子也。以庄子表章之意而目之为诋訾，不亦谬乎？抑《田子方》篇有云：庄子

见鲁哀公，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注家于此皆言此一丈夫意指孔子，夫曰丈夫指孔子是已。然庄子何以推尊孔子如其极？岂非以其所愿学者孔子，故托为此文以自见其意欤？是观于《天下》篇致慨于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特叙《六经》于百家之上，向往于邹鲁之士、搢绅先生犹能明之，不难比类而得。然则庄子之为儒而非道，断断然矣。若其言论时出入于老氏，则小大精粗道术本自有其相通之处。予向亦尝以为庄子殆兼孔、老两家之传，及今思之，是犹不免影响之见。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故其书中颜子之言既屡见不一，而若“心斋”，若“坐忘”，若“亦步亦趋”，“奔轶绝尘，瞠若乎后”云云，皆深微精粹不见于他书。非庄子尝有所闻，即何从而识之？更何得言之亲切如此？故窃谓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与孟子之传自曾子一派者，虽同时不相闻，而学则足以并峙。由是以观韩、苏之言，虽亦微有窥见。韩言出于子夏之徒田子方，既无有佐证，不足据。若苏云阳挤孔子而阴助之，实予而文不予。遍翻内外诸篇，即未见有挤孔子而不予之文；若其有之，则亦唯有子瞻所不取之《盗跖》、《渔父》等篇而已。是不得不深惜夫二子之仅通乎庄子之文，而犹未能穷庄子之学之真际也。或曰：庄子信为儒而非道矣；则其数讥儒、墨之是非，且有儒以诗礼发冢之论，抑又何欤？曰：子不读《荀子》之言乎？《荀子·儒效》篇差儒之等为三，曰俗儒，曰雅儒，曰大儒；而《非十二子》篇则曰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颇肆其丑诋。夫荀子岂非儒哉？盖欲存儒之真者，必绌儒之伪，孔子之所以恶似而非者也。庄子之意詎异于是？且读一书，必观其全，探其本，而后始能得其宗趣之所在。《庄子》之文，已固参差而难齐，深阔而难竟，而况注家又缴绕之以玄言，错乱之以训诂，则宜乎究其趣旨者之不易得也。予无似，其沉潜于是书者固有年矣。病夫旧注之多失也，因比附《六经》之义，亦兼采老子之说，为之疏通而诠释之，名之曰《庄子发微》。其有由是而上穷庄子之蕴以补予之不逮，使内圣外王之道不终湮没于世，此则区区之深望也夫。

庚子年秋九月钟泰序于海上之寓庐

内 篇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无内篇、外篇之名。至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所收崔撰注二十七篇，云：“内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六篇，云：“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其云无杂篇者，谓分内、外篇与崔本同也。司马彪注五十二篇，云：“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郭象注三十三篇，云：“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又李颐《集解》三十篇，云：“一作三十五篇。”孟氏注五十二篇，并未及内、外篇之别。自陆氏作《音义》，以郭为主，兹后，崔撰各本并绝，所行惟有郭注。说者每疑《庄子》内、外篇之目，率由注家意为更订，非庄学之徒相传之旧。顾细考之，外篇、杂篇，崔本以下虽各不同，若夫内篇，则各家皆七，无有违异。此自有所依据，当庄书原本如是。不然，安得各家皆巧合也？《艺文志》不言内、外者，盖本《七略》旧例。如儒家《孟子》十一篇，实内篇七，外篇四，赵岐《孟子题辞》言之甚详，而《志》则不分。今据《汉志》，遂谓《庄子》本无内、外篇，殆非其实矣。陆氏《庄子释文·齐物论》篇“夫道未始有封”条引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据此，则《艺文志》五十二篇，即已有内篇、外篇之分矣。七篇篇名，各有其义，与外、杂篇取篇首二三字为名者迥殊，是岂郭子玄辈所能臆造？即此一端，七篇之别于外、杂篇而自为一类，彰彰显甚。故窃以为外、杂篇有可疑，而内七篇则无可疑；外、杂篇有非庄子自作，而内七篇则非庄子莫能为。《天下》篇深致慨于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此内七篇，则所以反复发明内圣外王之学者也。是故《逍遥游》之辨小大，为内圣外王之学标其趣也。《齐物论》之泯是非，为内圣外王之学会其通也。《养生主》，内圣外王之学之基也。《人间世》，内圣外王之学之验也。《德充符》，则其学之成，充实而形著于外也。若是，斯内可以圣，而外可以王矣。故以《大宗师》、《应帝王》二篇终之。“宗师”者，圣之异名。“帝”者，王之极致也。是故内七篇分之则七，合之则只是一

篇。观《逍遥游》以南冥、北冥起，而《应帝王》以南海之帝、北海之帝收，首尾照应，亦可见也。是故欲通《庄子》，当以内七篇为本经，而以外篇、杂篇为佐训。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纵说横说，莫有能出七篇外者。而其瑕瑜纯驳，以七篇印之，则如判黑白，无所隐遁。校勘之家，未能观于《庄子》大旨，因后世诸书所引《庄子》内、外篇文与今本间有出入，乃进而疑及内篇亦多伪托，是则区区所未敢苟同者也。

消摇游

“消摇”，叠韵譌语也。外篇《天运》曰：“以游消摇之虚……消摇，无为也。”此谓无为则得消摇，非以消摇即是无为也。试析而言之。“消”者，消释义。《田子方篇》云：“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杂篇《则阳》云：“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是也。“摇”者，动荡义。外篇《天地》云：“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则阳》篇云：“复命摇作，而以天为师。”是也。盖消者，消其习心，摇者，动其真机，习心消而真机动，是之谓消摇。惟消摇而后能游，故曰“消摇游”也。训诂家每谓譌语当求其义于声，不得求其义于字。不知声与字不相隔，离字而专求声，则堕入于虚，未为得也。读《庄子》不可不通训诂，而泥于训诂，则不能以读《庄子》。此亦其一例也。“游”者，出入自在而无所沾滞义。一字曰游，双言之则曰浮游。外篇《山木》云：“乘道德而浮游。”又云：“浮游乎万物之祖。”是也。言游又言浮者，浮者，不沉溺也。惟能浮而后能游。此其理，善泅者无不知之。故外篇《达生》言丈夫之游于吕梁也，曰：“与齐俱入，与汨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与齐俱入”者，游也。“与汨偕出”者，浮也。游之义盖取诸此。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见《尽心》篇赵岐注曰：“嚣嚣，自得无欲之貌。”就已言则曰“自得无欲”，对物言则曰“不为私”。庄子之言游，与孟子之言游，意略同矣。窃蔚《庄子》一书，一“游”字足以尽之。故今三十三篇，内篇以《消摇游》始，外篇以《知北游》终，其余各篇，语不及游者殆鲜。而《天下》篇自道其学，则曰：“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旨趣所寄，不尤为可见乎？“消摇”，各本多作“逍遥”；“游”，多作“遊”，实非其旧。《释文》云“亦作”者，是也。因正之。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

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冥”，一作溟。冥其本字，加水旁作溟者，后人改也。何以知之？外篇《在宥》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天地》篇云：“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知北游》篇云：“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一书所以发端于“北冥”者，即取冥冥之义。若径作溟，则其义失矣。《释文》引梁简文帝云：“宵冥无极，故谓之冥。”观“宵冥”之解，亦作冥不作溟之证。且下文曰：“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于“海”上加“冥”字，作冥则可，若作溟，则曰溟又曰海，为不辞矣。北于《易》为坎之方，南为离之方。《说卦传》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夫离南为明，则坎北为暗可知。鲲化为鹏，由北而南徙，象昭昭生于冥冥也。然南亦谓之冥者，名从其朔，且以见微显一源，非有二也。老子曰：“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庄之言冥，犹老之言玄，故扬子云以玄对白，义可见也。见雄所作《解嘲》，曰“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云云。曰“鱼”者，取象于卦之中孚。《中孚》曰：“遁鱼吉。”是也。“遁鱼”，从虞氏《易》。卦气起于中孚。郑康成（玄）曰：“中孚为阳，贞于十一月子。”正坎之方也。“其名为鲲”者，“鲲”之为言混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也。继之曰“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则所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者也。并见《老子》书“化而为鸟”者，取象于卦之小过。《小过》曰：“有飞鸟之象焉。”是也。中孚旁通小过，故鱼化而鸟。康成曰：“小过为阴，贞于六月未。”则正离之方也。中孚阳而小过阴者，中孚之大象为离，而小过之大象为坎也。大象为离而居坎方，大象为坎而居离方，阴阳互根，是乃所以为易也。知夫阴阳互根之理，则知北称冥，而南亦可曰冥矣。“其名为鹏”，“鹏”之为言朋也。《坤》卦曰：“利西南得朋。”得朋犹得明也。详见虞氏《易》鹏言背，艮之止也。言“怒而飞”，震之动也。“海运”者风，巽也。“天池”者泽，兑也。盖于是坎离震巽艮兑，六子之卦，无不具备。六子之卦备，即六十四卦无不备，而总之者则为乾坤，故后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之言也。若以乾卦六爻说之，则鲲者，初爻之潜龙；遁鱼，犹潜龙也。化者，二爻之见龙；怒者，四爻之或跃在渊；飞者，五爻之飞龙在天；后言飞而有待于风之积，则三爻之终日乾乾；去以六月而必息，又所以免于上爻之亢而至悔也。是故庄子之言，多取象于《易》，而取义于老。取义于老，人或知之；取象于